

朱高正 著

从康德到朱熹

——白鹿洞讲演录



从康德到朱熹

——白鹿洞讲演录

朱高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朱高正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308 - 08772 - 8

I. ①从… II. ①朱… III. ①朱熹 (1130 ~ 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 文集 IV. ①B244.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773 号

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

朱高正 著

责任编辑 叶 敏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63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8772 - 8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序 一

■ 陈来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与我国宋代大思想家朱子有关。就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相比而言，应当说，白鹿洞书院与朱子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直接。岳麓书院本是湖湘学派讲学之地，朱子乾道三年到湖南访问张栻，曾一至岳麓书院，晚年绍熙五年朱子知潭州，在长沙三月，期间曾重振岳麓书院并讲学。而白鹿洞书院则是朱子在知南康军的整整两年中一手恢复经营、为之花费了大量心血的理学学官，所以白鹿洞书院对于朱子而言，意义更不同寻常。

淳熙六年己亥三月末，朱子到任南康，到任伊始，便大力抓教育：整顿南康军学，在军学中立濂溪祠，以二程配祀，请张栻作《濂溪祠记》。敦请当地学者入军学讲书，自己亦每四五天一至军学中讲学，其所讲者皆以四书义理为中心。订定太极通书，刻于南康军学，又校补张载《横渠集》刻于隆兴，序《程氏易传》刻于江州。这一系列教育文化活动，有代表性地体现了儒家士大夫注重地方文教的特点，同时也体现出朱子要把周敦颐等道学创始人过化的庐山一带建成理学发展的基地。

同年十月，朱子发现白鹿洞书院遗址，立即上状修复白鹿洞书院，亲自规划兴建事宜。按南唐时在白鹿洞建书院，号为“国学”，宋初尚有学徒，后因军学兴立而渐弛废。朱子认为白鹿洞书院本为儒学精舍，在佛道寺观遍布的庐山，实为罕有，所以朱子对白鹿洞

书院的重视，明显包含了抗衡佛道、光大儒学的文化意识。白鹿洞书院于次年淳熙七年三月落成，复建过程中朱子多次亲临视察工程。白鹿洞书院建成，朱子请吕祖谦为写《白鹿洞书院记》，以扩大其影响。吕祖谦的记文也认同朱子以白鹿洞书院为儒学说，乃云：“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渐而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赐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朱子又自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并请求江西各地政府支持藏书，使得书院建设很快便大见成效。书院建成后，朱子立即主持开讲，首讲《中庸》，使用的讲义即朱子的《中庸或问》。朱子还先后将伊川帖、康节文及二程门人帖刻于白鹿洞书院，以兴起后学尊崇道学之心。淳熙八年辛丑二月，陆九渊来访，朱子邀请陆至白鹿洞书院讲演，成为白鹿洞书院的一大佳话。朱子还奏请朝廷赐敕额及经书，以确立和提高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朱子对于白鹿洞书院之建设，真可谓殚精竭虑，功莫大焉。

从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活动来看，朱子之复兴白鹿洞书院，并不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其宗旨是以儒家经典和儒学义理为主题的讲习研讨。从《揭示》来看，第一条是“明伦”，讲根本价值；第二条是“穷理”，讲学问方法；第三条至第五条是“修身”、“处事”、“接人”，皆修身实践。朱子不仅规定了白鹿洞书院的教育方向，实际上全面地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教育宗旨、教育方针。朱子认为，教育和学习的目的，是“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这一思想与《大学》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齐家治国，是完全一致的。这一“修己一治人”的结构从孔子便确立了。孔子以来的儒家都认为，若要达到修己治人的目标，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朱子强调，修身是根本方法，及人是推致功夫，“讲明义理”则是教育学习活动的本质。“义理”是对辞章考据而言，是讲儒学学习的内容；“讲明”即是学问思辨、格物致知，是讲儒学学习的方法。

朱子这一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近世中国与东亚。

吾友朱高正博士，近赴白鹿洞书院讲学，集其讲学所录，成《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一书。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和《近思录》为主要内容，着力阐明濂洛关闽的主要思想，简明扼要，深入浅出，颇可见其理学的造诣。特别是他以朱子《揭示》为东亚近世学校的共同校训，这个提法，发人所未发，甚能点出朱子学教育思想的普遍意义，我以为是很值得重视的。

高正兄擅长讲演，讲演节奏有度，不急不缓，他又善于分析，解说明白，这些都是他的讲演得以成功的条件。而观其讲义，最为突出的感受，我以为也是其成功的最重要的特色，则是他的讲学态度。他并不是只去客观地介绍某一古人的学说思想，而是把朱子学的道理作为他自己真心服膺、笃信的思想，最为普遍一种的道理，循循善诱地讲说给世人，期使听者能够和他自己一样信服并接受朱子的思想。这种态度和讲学的方式，才是古人书院讲学的态度和方式，才是宋明儒者“讲明义理”的态度和方式。一言以蔽之，这是儒者的讲学，而不是教授的讲课！尤其是他所特别强调的，都是身心之学，所讲者皆基于自己的内在体贴，而予人以具体的指点。所以我以为，他的白鹿洞讲义和他的《近思录通解》，的确有古人之风！

高正讲义即将出版，谨序之如上，以向大家推荐。

2010年9月3日于清华大学立斋

序 二

■ 余敦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高正先生的这本“白鹿洞讲演录”与去年出版的《近思录通解》是姊妹篇，纯属研究朱子学的专著，但却冠以“从康德到朱熹”的正式标题，推想其用意，可能是强调这部著作主要是着眼于中西会通，以康德哲学作为会通的桥梁，来凸显朱熹哲学的当代意义。高正先生是朱子的第二十六代孙，又是获得博士学位研究康德哲学的专家，从学术的角度说，从事这种会通工作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就支撑这种会通工作的精神动力而言，却不仅仅是纯然出于学术的考虑，而是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的失落与重建忧心如焚，上下求索，探寻一条可行的出路。作者的这种心态，在阅读“白鹿洞讲演录”的过程中，是随时随地可以感受得到的。

所谓文化主体意识，是指一个民族自觉到其所拥有的历史传统为其所独有，并对此历史传统作有意识的省察，优越之处则发扬光大，不足之处则奋力加强，缺失之处则力求改进。一个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民族，知道面临问题时，如何衡量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能力，审时度势，将问题加以解决，从而超越传统，创新传统。但是，近百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淡薄了，失落了。因为轻视传统，甚至否定传统，对传统失去了回顾与反省的能力，以致面临问题时，不知何所适从，遑遑如丧家之犬。直到改革开放以来，在振兴中华的号召下，随着经济上创造出傲人的成就，民族的自信心与自尊心才逐渐恢复。其实，追求现代化不能脱离传统，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能完成现代化的。因此，当前中国需要推动一场思想再启蒙运动，来重建文

化主体意识。由于康德哲学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他的哲学标志着启蒙运动理智上成就的高峰，为了完成一场成功的思想再启蒙运动，康德哲学可以作为我们宝贵的借鉴，引领我们以最有效的方法直达启蒙的目标。

如果说当前中国的思想启蒙需要以康德为桥梁来会通中西，走一条从康德到朱熹之路，那么回溯到 18 世纪西方启蒙运动刚刚兴起之时，却是借助于以朱熹为代表的中国的理学来会通中西，走的是一条从朱熹到康德之路。在讲演录的第三讲《近代欧陆理性主义与新儒学的会通》中，高正先生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康德的哲学是何其深刻地受到中国理学的影响。只不过是从小德斯鸠与黑格尔以后，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没有像以前那么高，致使这段历史就隐晦不彰了。康德以前的莱布尼兹是 17 世纪欧陆理性主义的代表，他深刻受到中国理学的影响，这一点几乎已经是历史的定论了。他认为欧洲人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尤其在伦理道德与政治方面。他强调，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也拥有理性，但理性却在中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实践哲学的领域，理性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儒家学说对他而言，不仅正确，而且有用。继莱布尼兹之后，欧陆最主要的理性主义代表当推伍尔夫，他是德国启蒙运动的要角。伍尔夫与莱布尼兹一样，对中国文化极为推崇，他提及其实践哲学基本上与中国孔子的学说并无二致。伍尔夫认为，儒家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要比《圣经》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大。康德是伍尔夫学生的学生。康德之所以成为康德，最重要的是继承了莱布尼兹—伍尔夫这个体系，又超越了它而成为先验的理性主义。正因为康德是莱布尼兹、伍尔夫的传人，所以说他确实受到中国理学的影响。

通过这种“从康德到朱熹”又“从朱熹到康德”的双向互动的会通诠释，高正先生一方面站在启蒙哲学的高度重新解读了朱子，同时又把朱子的思想提升到启蒙哲学的高度，阐明其所具有的当代

价值。在讲演录中，高正先生结合自己切身的体验，随机评点，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闪光的思想。比如他指出，康德的启蒙哲学对当代伦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一个是对“自由”所下的定义，第二个是对“自由律”的发现。康德的“自由律”其实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康德的“自由”其实就是朱熹所说的“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外，关于理学的核心价值，高正先生指出，第一是认为每个人都可以经由自己的努力，成圣成贤。在西方，你再怎么努力，却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的。第二个价值，儒学非常重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但却没有个人主义的那种毛病。在这方面，朱熹比康德更有魅力，可以补足很多西方的不足。朱熹是东亚文明的代表。即使在还没有跟西方接触的时候，东亚文明圈已算是全球化了。现在我们已真真正正进入全球化了，朱子学将会随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而成为东亚文明跟西方文明对话的代表。就这一点上，白鹿洞书院在未来也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这些言论来看，高正先生这本讲演录，是立足于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的战略性思考，热切地呼唤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启蒙。

序 三

■ 郑翔 庐山世界遗产管理委员会主任

朱高正先生一日忽来电说，嘱我为其新作《从康德到朱熹——白鹿洞讲演录》写一篇序，自怵笔拙学浅，心中不免惶惶然。

朱高正先生出书是很自然的，但专为白鹿洞书院讲学一事而出书，虽是我没有想到的，却是我们极高兴的事。写序不容易，我之所以勉为一试，不是出于自信或是无知，而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不仅是对一位学者的尊敬，还因为弘扬庐山的儒学文化传统是作为一个庐山人的我所必须担当的责任。

大凡人们说起庐山的儒学，必是提起白鹿洞书院。而白鹿洞书院与一个人的名字是无法分开的，这便是朱熹。白鹿洞书院初创于南唐，朱熹使其发扬光大，始称“海内第一书院”。但是朱熹的功德不在于复兴了白鹿洞书院，而是因为他在此亲手开创了思想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正如近代大学者胡适指出的那样，“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宋学，即理学的大趋势”。人世间匆匆过客有如恒河沙数，能在天地间留下足迹的却寥若晨星，朱熹就是这样一位在几百年间给中国人的思想划下深深印痕的思想巨人。

但是，诚如朱高正先生讲的那样，由于西方思想的冲击和社会的巨变，自清末废除科举和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以来，儒学走下中国主流思想舞台已近百年，白鹿洞书院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之路，书院一度残破不堪，昔日书声琅琅的胜景也已不再现。

现代国家的竞争，最终可以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如何在现代化、西方化的大潮中，找寻儒学的时代价值，是时代赋予儒学的新命题。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继承和传播儒学的优秀传统

文化，特别是恢复了白鹿洞书院广延名家、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设立了白鹿洞书院讲坛，邀请了一大批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专家做客书院，进行学术研讨。朱高正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朱高正先生幼时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所以他对儒家学说的熟悉和理解是儿时熏习而就的。先生就读于德国波恩大学时，专攻康德哲学，而其对易经研究又颇有心得。缘于对中西方哲学的谙熟，朱高正先生对儒学产生兴趣并卓有成就是不奇怪的。

而为人所鲜知的是，朱高正先生是朱熹第二十六代孙。也许是缘分使然，他对庐山的喜爱是天生的。是年恰逢朱熹诞辰 880 周年，因此我们向先生发出邀请后，先生就欣然而来，让我们有幸聆听了先生五天的理学大课。

距先生来庐山讲学已有数月，如今再读先生讲学所结的文集，最大的感受还是当初的感受：精湛、深远。所谓“精湛”，是对先生学术造诣和治学态度的一种简单描述。或者这样描述更准确一些——他是一位具有坚持精神的学者。在风气浮躁的当今之世，能够潜心去讲儒学，坚持去做学问，乐道而不疲，确实难能可贵。所谓“深远”，是指先生的论说旨归。“道可因可革”，传统要为现代服务，学术要为社会服务。现代儒学要体现时代价值，必须有所传承，又有所创新。朱高正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朱子学说对现代人的品德修养具有极为深刻的启蒙意义。当然，要达到这样一种内敛而有力的境界是很不容易的，读者诸君如果能够在这本文集的时候感悟到这一点，或许就是朱高正先生的最大希求。

白鹿洞书院旁有一小溪，终年清澈见底，流淌不息。我每行至于此，心中总不由想起朱熹的两句诗：“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朱高正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纷至沓来，自由多样、包容并兼的思想活水方能延续不断，书院重光、儒学大兴之时亦不远了。

庚寅年初秋于庐山

目 录

- 第一讲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当代意义 / 1
- 第二讲 从《近思录》看新儒学的发展 / 39
- 第三讲 近世欧陆理性主义与新儒学的会通 / 70
- 第四讲 “格物致知”与全方位的读书法 / 103
- 第五讲 理学中“存养”与“克己复礼”的工夫 / 133
- 附录一 联邦德国的公民教育 / 166
- 附录二 “朱子学”对现代人修身的意义 / 198
- 附录三 从“新儒学”谈太极拳 / 210
- 附录四 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与重建
国际秩序的意义 / 232
- 附录五 “必也正名乎”——重点《传习录》有感 / 266
- 附录六 黄直卿《乾、坤二爻释义》解 / 275
- 附录七 古本大学新校本 / 279
- 附录八 古本中庸新校本 / 284
- 附录九 了凡四训新校本 / 292
- 跋 / 309

第一讲

《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当代意义

——重新解读近世东亚文化圈高等院校的共同校训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下午好！

当白鹿洞书院邀请我来这里讲学的时候，我就特别要挑在4月22日前后，为什么呢？因为今年4月22日，是西方近代第一大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286岁的诞辰，而今年的4月22日正巧是阴历的三月初九，是我先祖朱文公逝世810周年忌辰。今年海内外包括韩国、日本、东南亚国家为了纪念朱熹880岁的诞辰，有一连串的庆祝活动。当然包括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有很多的研讨会、祭典与其他纪念活动。在我的倡议下，今年的10月22日，也就是朱熹的生日，即农历九月十五，海峡两岸有史以来，同步发行朱熹的纪念邮票，分别在台北和武夷山举行始发式。

我相信，知识分子来到白鹿洞，心情难免都是极为激动的，因为这个白鹿洞书院在朱熹复兴之后，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写下的《揭示》，在宋朝理宗皇帝时就颁行全国的书院作为共同校训。《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全中国书院的校训，也成为朝鲜、越南、日本等这些深受中国儒家文明熏陶的东亚国家的书院的共同校训。我想，白鹿洞不只是九江的而已，不只是江西的而已，也不只是中国的而已，白鹿洞其实是整个东亚文化圈的一个文化资产。当我们进入全

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甚至可以讲，白鹿洞书院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遗产。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白鹿洞书院跟大家来作五场报告。我今天的主题是——《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当代意义。

《白鹿洞书院揭示》本来是六七百年来读书人共同遵循的一个教条，但是从1898年“戊戌变法”准备引进西方教育制度时，书院文化开始没落。而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度，书院文化则全面消失。不仅传统的《四书》、《五经》没能耐得住，连同书院的教条也跟着没落了。但在日本就不是这样。近代日本有两个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明治维新。第一个就是引进西洋议会制度的《明治宪法》，日本从那以后，就开始脱亚入欧。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文献，就是在明治二十三年，明治天皇亲自参考《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及《朱子家训》，而拟就的《教育敕语》。这个《教育敕语》，我父亲那一辈的台湾人都是很熟悉的。因为明治天皇通令全日本国的中小学校的每个星期一的第一节课叫做“修身课”，这个“修身课”一定要由校长亲自来讲，针对最近这一个星期发生在学校的或是发生在学校外面的重要事情，扣住天皇的《教育敕语》向全校师生来讲论。每个星期这样，校长要以身作则，通过每个星期的“修身课”，把对现实重要事情的评价跟天皇的《教育敕语》结合起来不断地讲论，以培养全日本国民的公是公非。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里，还是继承保留了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所以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我们不要的东西，人家日本拿去用，还用得很好。甚至到现在，日本部分学校每天上课前，教师还要带着学生朗诵这只有七十九个字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已有 830 年历史

为了让大家了解《白鹿洞书院揭示》，我在这儿先跟大家说明一下背景。朱熹是在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以秘书郎权知南康军州事

的身份，来接任南康军的知军，翌年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亲自题写《白鹿洞书院揭示》。事实上，朱熹在淳熙二年，也就是他46岁时，已经把《近思录》这本书编出来了。《近思录》这本书表面上是他跟吕祖谦用一个月的时间合编的，其实，一个月的时间不可能编出这一本《近思录》。他是准备了很久的，只不过是在淳熙二年的四月初，他的好朋友吕祖谦从浙江金华来到福建崇安看他，他就拉着吕祖谦，挂了吕祖谦的名字，因为吕祖谦在浙东的政学两界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编完之后，他们就一道赴信州府（今江西省上饶地区）铅山的鹅湖寺去跟陆九渊兄弟论学。我是研究康德的专家，如果我要去摘录康德一两百条最具代表性的言论，谈何容易！而朱熹一个人竟然能够从北宋最杰出的四位大儒留下的十四部巨著中，摘录出622条，并按照他个人对理学的理解，将这622条分编在十四卷之中，而且摘录得极为精当，不愧是大家手笔。过了四年之后，朱熹来到南康这个地方，兴复白鹿洞书院。我告诉大家，大家只要研读《近思录》之后，再来看《白鹿洞书院揭示》就可以一目了然。

《近思录》这本书，对现代人来讲，可能变得很陌生了。我第一次接触《近思录》这本书，是我念高三的时候。《近思录》是怎样的一本书？我简单跟大家讲，其实就是朱熹把“北宋五子”——即北宋最杰出的五位大儒——挑出了四位，就是周敦颐、程颢程颐两兄弟，再加上张载。朱熹在编《近思录》的时候，希望学者不要好高骛远，而应循序渐进，而偏偏“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是研究《易经》里数学派的巨擘，智慧很高。他不鼓励一般的初学者从邵雍学起。为什么书名叫《近思录》？它是采用《论语》里子夏讲的一段话——“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我们要做学问，要修身养性，不要一开始就做些太难太高的题目，而应该从你身边周围的事情一步一步地由易而难、由近而远、由小而大、由简而繁，循序渐进。他认为，学不可躐等，教学生也不要躐等，要一步一步来。所以，大家仔细看，朱熹一辈子最用心注解的书，公认

是《四书章句集注》。在《四书章句集注》里面，他花时间最长，用力最深的，非《大学》莫属。大家知道，《大学》讲的就是“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也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还特意为《大学》这本书的第五章补了一段《格物致知传》，这一段真是千古名作，才134个字。这一段文字，大家有空尽量要把它背下来，因为不论学什么东西都离不开这段话。我打个比方，我喜爱太极拳，我就把《格物致知传》这段文字拿给太极宗师级的人物看，他们一看，也非常认同。不仅是读书、练拳、做人而已，学习任何事情都是同样的道理。其中有一段话——“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是从简单的、已经知道的义理为基础，然后继续推扩它，把它推到极致。然后说——“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只要你工夫用到了家，就会突然顿悟。“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就叫“格物穷理”。朱熹讲得很清楚，致知与格物是同一件事：“格物”讲的是我们所要穷究事物的理；而“致知”是要让我们人心能知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哲学上讲的心物问题，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实“格”、“致”、“诚”、“正”都是为了修身。修身之后干嘛？推以及人，要能齐家，能治国，然后能平天下，把你所得的分享给别人，让至理大道能够推行于天下。这点很重要，刚才我讲修身课，修身是最重要的，就如《大学》所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再来看看，《近思录》中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四个人，有什么关系呀？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周敦颐年纪最大，二程兄弟的爸爸程珦初看到周敦颐时，就发现这个人不简单。大家记住，周敦颐也当过南康知军，比程颢年长15岁。程珦认为周敦颐人品高洁、学问渊博，就积极结交周敦颐为友，并在程颢15岁、程颐14

岁时，安排他们两兄弟跟着周敦颐学习。也就是说，周敦颐跟二程的关系是师生关系，而这种关系，就我的研究，还是一辈子的师生关系。有人说，程颢、程颐只跟周敦颐学过几年，这是不符合史实的。程颐 18 岁时就已经名满天下。我们书院文化有个关键人物——胡瑗，即胡安定，他在太学里题试诸生说，在孔门弟子中，孔子最欣赏颜回，孔子为什么称赞别人，而特别称赞颜回呢？到底颜回学的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程颐在游京师的时候，就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胡安定先生一看到他的文章，大为赏识，马上约见，并聘他为学职。吕祖谦的五代先祖吕希哲那时跟程颐虽是同学，但就已经向程颐执弟子礼，所以二程很早就有名气了。张载的年纪比程颢大 12 岁，程氏兄弟要叫他表叔，张载就是程珦的表弟。但是张载从学术传承来讲，是二程的弟子，受到他们兄弟俩的点化。《近思录》这本书，就是朱熹把“北宋五子”的书都读完后，除了邵雍以外，将其他四位先贤的值得后人学习的著作、言论与事迹，挑选出 622 条，并将它们分编为十四卷，其实这就是朱熹所重构的理学，也是朱熹版的《大学》。后来明朝、清朝所编纂的《性理大全》、《性理精义》无不是按照朱熹《近思录》的顺序来安排的。所以《四库全书》推崇《近思录》为“性理诸书之祖”。从此以后，所有讲性理的书籍都是按照《近思录》的顺序来安排的。也因为《近思录》将濂、洛、关的理学领军人物的思想精髓汇编成中国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朱熹因此成为理学之集大成者。

《近思录》不宜从卷首看起

《近思录》卷首的第一条，我第一次读到两句，就读不下去——太难了。卷首第一条是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本文前段是：“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